

自注纪实与诗法新变：欧阳修《答通判吕太博》对西昆体诗风的修正

全泓竹^{1*}, 刘奕萱²

¹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²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辽宁 沈阳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7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7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4日

摘 要

《答通判吕太博》作于皇祐元年欧阳修知颍州时期。诗中追忆其知扬州时的荷花酒令之盛, 并以三条自注补足“邵伯荷花”“采莲千朵插以画盆”“传花摘叶为酒令”等本事。该诗属应酬诗内部对西昆体诗风进行的修正。本文先校核诗句与自注异文, 再以《西昆酬唱集》中刘筠《荷花》为参照, 分析欧诗如何在同属咏荷、宴饮的语境中, 以实景、本事、今昔对照和平易文气弱化西昆诗常见的密典化、书卷化倾向。本文认为, 欧阳修并非简单废弃典故、声律和文采, 而是以现实经验为诗歌材料的组织中心; 其“前六句追忆盛游、尾联转入颍州西湖寂寥”的结构, 使七律获得近于古文记事的叙事层次。由此可见, 欧阳修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以事实支点、自然文气和真切感慨重组应酬诗材料, 推动宋诗由单纯竞丽用事转向重事、重意、重情的表达方向。

关键词

欧阳修, 《答通判吕太博》, 西昆体, 自注, 以文为诗, 宋诗

Documentary Self-Annotation and New Transformations of Poetic Technique: Revising the Xikun Poetic Style in Ouyang Xiu's *Reply to Tongpan Lv Taibo*

Hongzhu Quan^{1*}, Yixuan Liu²

¹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²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第一作者。

文章引用: 全泓竹, 刘奕萱. 自注纪实与诗法新变: 欧阳修《答通判吕太博》对西昆体诗风的修正[J]. 国学, 2026, 14(4): 1109-1114. DOI: 10.12677/cnc.2026.144156

Abstract

Reply to Tongpan Lv Taibo was composed in the first year of Huangyou era when Ouyang Xiu was serving as the governor of Yingzhou. The poem recalls the prosperity of the lotus wine toast during his tenure as the governor of Yangzhou, and supplements with three self-notes detailing incidents such as “Shao Bo’s lotus”, “collecting thousands of lotus flowers to decorate a painted basin”, and “passing flowers and picking leaves as a wine toast”. This poem represents a revision of the Western Kun style within the realm of social poems. This article first verifies the variations between the poem and the self-notes, and then, referencing Liu Yun’s “Lotus” from the “*Western Kun Poetry Collection*”, analyzes how Ouyang’s poem, within the same context of praising lotus and banquets, employs real scenes, historical incidents,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plain language to mitigate the tendency towards dense allusions and scholarly style commonly seen in Western Kun poetry.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Ouyang Xiu did not simply discard allusions, rhythms, and literary grace, but instead used real-life experiences as the organizing center for his poetry materials. His structure, which begins with six lines reminiscing about a grand tour and transitions to the solitude of West Lake in Yingzhou in the last two lines, endows the seven-character quatrain with a narrative layer akin to ancient literary accounts. Thus,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key to Ouyang Xiu’s poetic innovation lies in reorganizing social poem materials with factual support, natural language, and genuine emotions, pushing Song poetry from a mere focus on beauty and allusions to an emphasis on events, meanings, and emotions.

Keywords

Ouyang Xiu, *Reply to Tongpan Lv Taibo*, Xikun Style, Self-Annotation, Poetry in Prose, Song Poet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讨论欧阳修对西昆体诗风的修正, 首先需要避免两个简单化判断: 其一, 不能把宋初诗坛概括为西昆体单一主导; 其二, 也不能把西昆体简单等同于词采铺陈。宋初诗坛有白体、晚唐体、西昆体等多种取向并行, 真宗朝馆阁唱和使西昆体影响显著, 但其华美、博雅、重视才学的一面同样构成宋初文坛秩序的一部分。方智范对杨亿及西昆体的再认识, 已经指出西昆体不宜只作贬义化理解; 许浩然关于“西昆”与“平淡”诗风的研究, 也提示我们应将诗风差异放回馆阁阶层、仕宦环境和审美趣味中观察[1][2]。

已有研究大体形成四个相关脉络。第一, 关于欧阳修诗学, 国内研究多从古文运动、文道关系、平易文气及其与梅尧臣、苏舜钦等同代诗人的互动切入。刘宁从欧阳修诗歌的平易特色入手, 揭示其在题材、语言和情感表达上的平实取向; 谷曙光考察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及其与宋诗奠基的关系; 马茂军则从“以文为诗”话题说明诗文互渗在中国古典诗学中的意义[3]-[5]。第二, 关于西昆体, 方智范、许浩然等已经提示, 应将其置于馆阁唱和、士人阶层和审美趣味之中理解; 许瑶丽关于西昆文风在科场传播与影响的研究, 也说明西昆体与宋初文教政策、科举制度和馆阁文士活动之间存在密切关系[6]。第三, 关于诗人自注, 俞悦芝等从白居易、元稹等中唐诗人出发, 说明自注具有提示本事、预设读者和补足阐

释的功能[7]。第四,关于“以文为诗”,学界多注意到宋诗叙事、议论和平易文气的展开,但较少把一首具体自注七律作为观察欧阳修诗歌“纪实化”转向的文体机制来讨论。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不把《答通判吕太博》仅仅看作一般应酬诗或咏荷诗,而是揭示“自注”作为一种文体手段,如何成为欧阳修实现诗歌纪实化转向的具体技术路径。

客观来看,以往将西昆体概括为“典故堆砌、辞藻繁丽、虚情写意”,能指出其流弊,却存在表述过满的问题。西昆体的确常以精密用事、绮丽辞采和书卷化意象见长,在后世批评中也屡被视为宋初诗文转变的反面参照;但更严谨的说法应是:西昆体的部分咏物、应酬诗容易形成以典故系统替代现场经验、以字面精工压倒情事本身的倾向。欧阳修的意义不在于全盘否定这一传统,而在于重新调整诗歌材料的主次关系,使真实经历、现实场景和自然文气进入诗歌中心。

本文选择《答通判吕太博》为中心文本,因为这首七律不是直接发表诗论,而是在一首应答诗中保存了自注。本文所称“自注”,指诗集中随正文保存、以作者口吻说明本事的注语;这三条自注把诗中的荷花、画盆、酒令落实到可考的地点、行动和规则上,显示欧阳修如何在近体诗格律之内引入古文式的纪事功能。文章以刘筠《荷花》作为参照,二者同处咏荷、宴饮和文人唱和的语境,便于观察“以典营象”与“因事成诗”两种方式的差别。

为避免核心概念泛化,本文作如下操作性界定。其一,“修正”并非指欧阳修在价值上否定西昆体,而是在共享应酬诗题材和雅致追求的前提下,对诗歌核心素材来源与组织方式的自觉调整,即由以典故网络经营意象,转为以亲历事件统摄意象、章法和情感。其二,“事实支点”指自注和诗句共同标出的地点、行动、器物或规则,如“邵伯荷花”“采莲千朵”“画盆围席”“传花酒令”等,它们为诗中回忆和情绪转折提供可辨认的依据。其三,“真实经验”指经诗歌选择、压缩和重组后的主体经验,而非原始生活的直接复制。诗中所谓“事实”具有文学建构性:自注把若干生活环节固定为可叙述本事,正文再据此组织今昔对照和寂寥感慨;因此,这种“真实”更接近服务于主题和情感表达的艺术真实。

2. 《答通判吕太博》的文本校核与自注功能

(一) 诗句与自注的校核

《答通判吕太博》见欧阳修居士集卷十一,题下注其作年为皇祐元年[8][9]。本文采用下列文本:

千顷芙蕖盖水平,(自注:邵伯荷花,四望极目。)

扬州太守旧多情。

画盆围处花光合,(自注:予尝采莲千朵,插以画盆,围绕坐席。)

红袖传来酒令行。(自注:又尝命坐客传花,人摘一叶,叶尽处饮,以为酒令。)

舞蹈落晖留醉客,歌迟檀板换新声。

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后无人看落英。

关于首条自注,有“郡治荷花,四望极目”与“邵伯荷花,四望极目”的异文。本文采用“邵伯”,理由有三:一是四部丛刊本系统保留“邵伯荷花”的读法;二是诗中“扬州太守旧多情”明指欧阳修旧知扬州之事,邵伯湖在扬州北,与诗意相合;三是叶梦得《避暑录话》亦记欧阳修暑日携客游平山堂,遣人取邵伯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与本诗自注相互印证[10]。因此,采用“邵伯”比泛称“郡治”更能凸显诗歌的本事指向。

(二) 自注的文体功能:从“藏典”到“明事”

自注并非欧阳修的首创。中唐诗人白居易、元稹等已频繁在诗作中运用自注,借以辅助读者理解诗中本事和情志。在《答通判吕太博》中,自注被有效地纳入一首七律的意义生成过程,形成“正文凝练

抒情、自注补足事实”的诗注互证格局。

这三条自注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繁复训诂,而在于说明诗句背后的事实结构。第一条注语点明地点和景观规模;第二条注语说明采莲、插盆、围席等宴饮陈设;第三条注语交代传花摘叶、叶尽处饮的酒令规则。若只读正文,“千顷芙蕖”“画盆”“红袖”都可能被理解为一般化的审美意象;加入自注后,这些词语获得明确的生活出处,诗歌因而不只是咏荷场面的虚拟铺陈,而成为一次旧游旧事的凝缩回忆。

3. 参照系: 刘筠《荷花》与西昆体咏荷方式

刘筠是西昆体范式的重要代表,《西昆酬唱集》收其《荷花》一诗。此诗以“水国开良宴,霞天湛晚晖”起兴,继而连续使用宓妃、莫愁、支机、交甫佩等典故,将荷花宴饮场景纳入神女、闺情、仙话和古事的联想系统^[11]。从艺术效果看,它能造成清丽绵密、典雅富艳的审美氛围;从本文的问题意识看,它也显示西昆体咏物应酬诗的一种常见方式:荷花本身并非主要叙述对象,诗人更关心如何凭借典故网络生成华美意象。

这种写法并不等于没有艺术价值。西昆体的书卷化、精工化与馆阁文学环境关系密切,其用典能力、声律修辞和文化象征系统,也与宋初馆阁唱和、科场传播及文教政策环境互为表里^{[1][6]}。问题在于,当典故组织压倒现实经验时,诗歌中的宴饮、荷花、宾主关系容易被抽象为可反复套用的雅事模板。读者能够看到宓妃、莫愁、织女和交甫佩,却难以辨认具体地点、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件。

以此为参照,《答通判吕太博》的新意更为清楚:它同样写荷花、宴饮和风雅旧事,却不把重点放在神仙传说和古典代称上,而是把“邵伯荷花”“采莲千朵”“画盆围席”“传花酒令”这些可叙述、可追忆的现实细节放在诗歌中心。欧阳修并未抛弃诗的审美性,诗中仍有“芙蕖”“檀板”“落英”等雅词;但这些雅词不再是炫示才学的核心,而是服务于本事、时空和感慨的表达。

4. 《答通判吕太博》对西昆体诗风的修正路径

(一) 取材: 从书卷典故到亲历本事

西昆体咏物诗常以典故为材料中枢,物象经过层层典故转化后,成为古典知识系统中的符号。《答通判吕太博》则把亲历本事放在首位。首句“千顷芙蕖盖水平”不是泛咏荷花繁盛,而是由自注落实为“邵伯荷花,四望极目”;颌联“画盆围处花光合,红袖传来酒令行”也不是寻常宴饮套语,而是由自注说明为采莲千朵、插以画盆、围绕坐席,以及坐客传花摘叶、叶尽处饮的具体酒令。

这一路径与北宋诗风转变中的“文道并重”倾向相通。王福元指出,北宋前期文道观经历了从重道、重文到文道并重的演变,欧阳修吸收不同文学观念后,重建了文与道、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关系^[12]。在《答通判吕太博》中,形式并没有被废弃,七律的声律与对仗仍在;但形式不再自足,而须回到有事实、有情感、有回忆对象的内容上。这正是欧阳修修正西昆诗风的关键。

(二) 章法: 从平列铺陈到今昔对照

刘筠《荷花》的展开方式,基本是围绕荷花与宴饮意象作横向铺陈:晚晖、水国、神女、佳人、鼓瑟、支机、交甫佩相继出现,形成精美而平列的意象链。《答通判吕太博》则具有更明显的时间结构。前六句都在追忆旧日扬州之盛:先写邵伯荷花满目,再写画盆围席、传花行令,继写歌舞留客、檀板新声。尾联“如今寂寞西湖上,雨后无人看落英”以“如今”二字陡转,把读者从扬州旧游带到颍州西湖的当下。

这种结构不是单纯的近体诗起承转合,而是具有叙事性:先铺陈旧事,后转入现境,以盛游之记忆反衬眼前之寂寥。马茂军论“以文为诗”时指出,该话题表面是诗文技巧互渗,深层则关联诗歌由抒情传统向叙事性、议论性展开的变化^[5]。据此看《答通判吕太博》,其“以文为诗”并不表现为把律诗写

成散文,而是把古文常见的记事、转折和感慨逻辑压缩进八句之中,使一首应答诗具有可追踪的时空层次。

(三) 语言: 平易叙事与审美节制

《答通判吕太博》诗歌语言有日常用语,但此诗仍有文人雅语,如“芙蕖”“檀板”“落英”;它并非白话化诗歌。但与西昆体惯常的密集用典相比,欧诗语言更重在使事件可读、情感可感。“扬州太守旧多情”一句直承作者旧任扬州的身份记忆;“画盆围处花光合”“红袖传来酒令行”写明晰的宴集场景;“如今寂寞西湖上”则直接标出情绪转折。

因此,本文将其语言特征概括为“平易叙事与审美节制”。所谓平易,不是粗率浅白,而是减少僻典险句,让读者不必依赖繁复训诂也能进入诗中场景;所谓节制,不是取消文采,而是让文采服从本事和情感。欧阳修对西昆诗风的修正,正在于把语言从炫技性的典故竞赛中释放出来,转而承担叙事、追忆和抒情功能。

(四) 形制: 诗注互证与纪实效果

《答通判吕太博》最值得注意的外在形制,是“七律正文+散文化自注”。正文负责凝练场景与情绪,自注负责补足地点、行为和制度性细节;二者合读,才能完整理解诗意。这种形制并非前无古人的“首创”,但在此诗中呈现出鲜明的纪实效果。

具体而言,正文中的“千顷”“画盆”“酒令”具有诗的概括性,自注则把概括性词语还原为可叙述事件。若无自注,此诗仍可读作一般荷花宴饮诗;有了自注,它便成为欧阳修在颍州回望扬州的一段旧事记录。自注并不削弱诗的含蓄,反而使尾联“寂寞”“无人”的感慨更有重量:眼前西湖的雨后落英之所以显得冷清,正因为前文被自注坐实为曾经极热闹、极具体的旧游。

5. 诗学意义: 在应酬诗内部完成诗风转向

《答通判吕太博》的诗学史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个案:欧阳修不是在应酬诗之外另立新体,而是在应答、咏荷、宴饮这一传统题材内部改变诗歌的组织方式。西昆体擅长以古典知识营造华美空间,欧阳修则以自注落实本事,以今昔对照生发感慨,以平易文气贯通诗句。这种修正使应酬诗不再只是才学展示,也能成为个人经验和现实情境的载体。

从北宋诗风演进看,欧阳修的做法与梅尧臣、苏舜钦以来重平淡、重生活经验的倾向相呼应。许浩然关于“西昆”与“平淡”诗风的研究提示我们,二者并非单纯优劣关系,而是不同阶层、不同文学环境中的审美选择^[2]。《答通判吕太博》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没有简单取消西昆体所珍视的雅致与风流,而是把雅致与风流重新置于可感、可证、可追忆的生活场景中。

从“以文为诗”的角度看,这首诗也说明:欧阳修的“以文为诗”不应被机械理解为用散文章法破坏诗体,而应理解为把古文的记事精神、转折结构和平易文气融入诗歌。马茂军指出,“以文为诗”在中国诗学史上牵涉诗、文两种文体的互渗与边界重估。欧阳修此诗正体现了这种互渗:它仍是合律的七律,却借助自注和叙事结构扩展了近体诗的表达容量。

6. 结语

欧阳修《答通判吕太博》并非通过一首诗完成对西昆体写法的整体替换,而是在同类题材和相近应酬场域中,对西昆体偏重密典、竞丽和书卷化意象的写法作出有意识的修正。诗中的三条自注把荷花宴饮落实为邵伯荷花、画盆围席和传花酒令,使正文获得事实支点;前六句追忆扬州旧游,尾联转写颍州西湖雨后寂寥,则使律诗获得今昔对照的叙事张力。

由此看,欧阳修诗风转变的核心并不是简单反对文采、典故或格律,而是要求诗歌回到真实经验、

明确情事和自然文气之中。它对西昆体的修正,也不是文学史上新旧二分的粗暴替代,而是在继承宋初馆阁文学雅致传统的同时,重新确立“言之有物”“因事见情”的表达原则。《答通判吕太博》篇幅不大,却能以诗注互证的方式呈现欧阳修诗法新变,是观察北宋诗歌由竞丽用事转向重事、重意、重情的重要个案。

参考文献

- [1] 方智范. 杨亿及西昆体再认识[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6): 3-9, 17-120.
- [2] 许浩然. 诗与仕: 阶层分野之下的“西昆”体与“平淡”诗风[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53(4): 97-108.
- [3] 刘宁. 论欧阳修诗歌的平易特色[J]. 文学遗产, 1996(1): 52-60.
- [4] 谷曙光. 论欧阳修对韩愈诗歌的接受与宋诗的奠基[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85-90.
- [5] 马茂军. “以文为诗”话题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展开[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177-189.
- [6] 许瑶丽. 西昆文风在科场的传播与影响考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33(11): 171-177.
- [7] 俞悦芝. 论中唐诗人自注其诗体现的读者意识——以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为中心[J]. 文艺理论研究, 2016, 36(1): 148-156.
- [8]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李逸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 [9] 欧阳修. 欧阳修诗文集校笺[M]. 洪本健, 校笺.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 [10] 叶梦得. 石林燕语·避暑录话[M]. 田松青, 徐时仪, 点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 [11] 杨亿. 西昆酬唱集注[M]. 王仲荦, 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 [12] 王福元. 儒学复兴与北宋前期文道观的嬗变[J]. 中华文化论坛, 2021(5): 100-114, 158.